

目 录

红军在襄陵轶闻.....	秦书元 (1)
忆红军在定兴沟的伏击战.....	胡世英 (3)
抗战初期汾城党的敌工工作回忆.....	 <u>郑怀礼</u> (5)
回忆我在牺盟总部政治交通局.....	邱文选 (20)
“兵农合一”害死人.....	关民选 (26)
“兵农合一”暴政在北陈村实施后的恶果	王勃生 (27)
哭五更.....	狄西海供稿 (29)
老村副关清廉之死.....	关民选 (32)
民国末期原汾城县辖村庄“防共碉堡” 布设.....	杨如茂 (34)
民国时期军扰民遭殃实录.....	杨如茂 (39)
一支农民自发的抗日义勇军纪实.....	

.....	师锺岱	(41)
轶闻二则.....		
.....	贾启昌口述 梁吉凤记录	(44)
抗日战争一例.....		
.....	石满斗口述 石培宽整理	(45)
抗日战士陈满仓之死.....	梁吉凤	(47)
汾城“三青团”实况.....		
.....	胡启明口述 胡世英整理	(48)
赵曲轶事.....		
.....	邓学礼 孙德胜 刘程九 李成溪	(51)
抗战胜利前夕原汾城县社会治安一瞥		
.....	杨如茂	(57)
徒手夺枪捉匪救父.....	王之椿	(59)
晋集仁博士传略.....		(62)
邓新田先生传略.....		(63)
董登山传略.....	高树帜	(65)
柴子固同志追悼会纪实.....	杨如茂	(67)
孙金仓烈士传略.....		(72)
邓志勇烈士传略.....	樊子琚	(74)
襄汾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77)
原襄陵县第一高级小学概述...	秦书元	(104)

襄陵县立女子高初两级小学简述·····	秦书元 (108)
原汾城县抗日战争前教育情况·····	李桂生 (110)
抗战初期的赵康编村民革小学·····	<u>吴吉祥</u> (112)
回忆我的老师郑诚斋先生·····	孙觉民 (115)
辛勤的园丁 默默的奉献·····	(120)
襄汾县蒲剧团史·····	狄西海 (126)
古城镇民国以来新兴村落——五里墩 ·····	王弼承 (130)
“川心店”的变迁·····	<u>李子实</u> 邓茂轩 (131)
襄陵县最早的搬神活动·····	秦书元 (133)
抗日战争前古城镇商业简述·····	贾毓秀 (135)
民国期间的币制沿革·····	刘江汉 (136)
邓庄镇上北梁村“灵光寺”文物宝塔 “塔顶”丢寻始末·····	郭占荣 (138)
“平水”依然拖蓝·····	秦书元 (139)

红军在襄陵轶闻

秦书元

怜孤恤寡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红军攻破襄陵县城后，为了充实抗日救亡之财力，特向地方上富户募集救国捐。当时南关刘青云、孙子和、亢云霞及城内刘炳琨、刘炳耀兄弟、刘万祥等出名户都酌情派了捐款数目。城内“兴义社”（街道名）乔天泰家也给派了五百元，条子贴于他的大门上。说来他家也较富裕，开有赁器铺（出租红、白喜事之花桥、棺罩及碗盏等物），土地也不少，但多是中等地，还有房院两座。由于乔天泰幼年丧父，家务由其年迈的祖父乔士熊操持，因无劳力，赁器业也不景气，当时其家境已衰落下来。乔士熊夫妻逝世后，家中留有孀居的两个儿媳，孙儿天泰年轻不懂理家，因而家境更趋衰落。红军进城后，因其旧名声，所以也给他家派了五百元捐款，在此情况下，天泰及其妻刘暖心虽向亲友四出筹借，但只借得一百元钞票（当时要交银洋）。

第二天，红军负责收款者至其家收交，刘暖心交出所借的一百元钞票。催交者说：“要交银洋，你没五百，还没四百，为了抗日救国嘛。”刘暖心说：“确实没有，要有还不舍得！就这也是借的”。当时街道干部阎长梁俊英亦在场，见此情况，就摆了摆头，示意刘暖心外出。到了门外，

梁俊英说：“刘万祥家住有一位干部，你可去见见，说明你家中情况，看能否减免”。于是暖心就相随梁去见了那位干部，详叙了家中实情。那干部又问过梁俊英后说：“象这样的家境，老的老，少的少，赁器业也不好，怎能派五百元呢？”随即写了便条掏出一张名片，交给刘暖心说：“你回去吧，把这条子和名片交给他们。”刘暖心回到家中，把便条交给了催款者，忘了交名片。那位催款者看了便条，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刘暖心因识字不多，只知念她名片的姓毛，心中非常感激。不意第三天下午催交者又把他叫到东关一家，仍然催交，因刘暖心交不出钱，就没让她回去。次日黎明，刘暖心被带上和部队一同向汾东出发，同行者尚有未交款的刘炳琨等。晌午时分，部队行至临汾东坑村西门外，恰巧那位曾给刘暖心开条子的干部碰到刘暖心，便惊奇地问：“怎么你也来了？”，刘暖心说明了原委，那位干部说：“你站出来，回去吧！”刘暖心站立一旁，等部队走后，就回路往回走。行至中途，适遇来寻找她的亲戚，遂得以顺利返归。家中的老人们听说她被带走了，找亲友到处打探。正在焦急，见刘回来了，心才放下，高兴不已，及听刘暖心说明了经过，两位老人感激的流出了热泪，齐声说：“红军的政策就是好，不然，谁怜悯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看分书

襄陵城内的毛凤山住宅好，还有市房，开着面铺、银楼，劳力也多，从外场看，闹得也算够红了。可红军进城后，他家没有派救国捐，这是啥原因呢？事情原是这样：当红军进城后向富裕者派救国捐时，作过一些了解，也风闻毛

忆红军在定兴沟的伏击战

胡世英

一九三六年四月间，红军攻克襄陵县城后，消息传来，汾城农民莫不喜展眉梢，互相传告，汾城的官吏豪绅唯恐厄运降临，四处求援，并把县城内的商户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强迫给他们夜间执灯在城上守城巡逻。就在这当儿，红军武装小组早已在汾城附近要道及三区（赵康一带）活动起来。四区（古城一带）与襄陵连接的村庄，红军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和斗霸分粮活动。

（上接2页）凤山家人手多，有生意，各方面挺活道，可实际如何呢？尚未十分了解，所以暂未定数字，还要作全面深入调查。

第二天，有个红军同志去到毛凤山家进一步访问，籍以了解实情。毛凤山说：“我家有五个孩子，房子说来仅够住，可因人口多，生活担子也重，故做点买卖，好时勉强糊口。又由于孩子们结婚、求学、尚累有些饥荒（外债），因之给孩子们分家时，每人都分了些饥荒”。说罢，就拿分书。红军干部听了情况，看了分书，知道了实际情况，毛凤山并不象人传说的那样富有，派救国捐的事也就不提了。接着询问了碾楼、磨房的一些情况，讲述了红军的政策、抗日救国的道理。毛凤山全家听了，对红军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疑团被打消了。邻友闻知后，认为红军办事细致认真，从实际出发，使人心悦诚服。

红军到处宣传救国、救民、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人民称之为：“爱民军，救民军。”都乐为招待吃住、作向导。

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旬，有一支南军（指蒋军），约一个连的兵力，由新绛开向汾城，这支狂妄的蒋军，以为汾城是太平境地，没有红军活动，大摇大摆向汾城挺进，一个排行进到定兴沟洼地路段时，突然几颗手榴弹从空掉下来，在蒋军中爆炸，接着冲锋枪扫来，当场蒋军排长被击毙，炸死扭死十余人，受伤者七人，战斗仅用了二十分钟。红军游击小组与向导者泰然自如的走去。

与此同日，二区西毛沟疙×庙一带红军游击小组也击溃了蒋军一个连。

当时红军在汾城境内并无大的战斗，而且停留的时间也不长，但豪绅、恶霸闻风丧胆，同时也在群众中撒下了红色革命种子，传播了革命道理，受此影响，当时全县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农民眼上红军去闹革命。如：三区赵康李二活、晋城李发元、南柴景福祥、原属汾城乐利庄家日胜就是一九三六年随红军北上抗日，外出闹革命的例证。

＜附记＞

蒋军中有三名重伤员，用门板抬送到史威村，增派青年杨俊彦等五人接力转抬直送新绛蒋军驻地，他们亲见有伤员十多人。

根据定兴村抬担架的青年说：那些日子红军在定兴、清储镇、小赵凹一带活动，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和杀富济贫分浮财分粮食的情况，人们莫不拍手称快。从此，红军的形象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深深的扎下了根。

抗战初期汾城党的敌工工作回忆

郑怀礼

(一)

……略。

(二)

我于一九三八年农历三月二十二日，经郭庆基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地址在盘道新院曹起立场里）。

五月，赴乡宁上章冠乡吉特委训练班学习。返回后任汾城县委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和县委书记廉怀德同志专搞汾城建党工作。这时候，我才正式认识了程谷梁同志。这个老兄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真真正正的人。真真正正的共产党员。你看他慈祥和蔼，却对工作一丝不苟，要求极严。你觉得他道貌岸然，却非常诚恳，毫不虚伪。他是我走向革命的启蒙老师，他是追求光明的引路人。在这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我能够多多少少给党作了一些工作，我能够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都是和程谷梁同志的教导分不开的。那时候大家都怕他，但又很爱他、尊敬

（上接4页）红军在赵康一带绕道转向新绛苏村、光村一带集合，沿路群众主动送水送饭表示欢迎，群众都说这样的军队才是我们人民的大救星。

他。汾城县革命阵营内形成了“只要谷梁一句话，说叫干啥就干啥”。在党的领导和各种因素促进下，汾城建党工作势如高屋建瓴，顺序猛进，截止一九三八年，汾城全县已有三百八十多名党员，是乡吉特委党员最多的县份之一了。

就在此时，汾城、襄陵、乡宁、吉县、新绛、河津、枯山七个县的抗日自卫队，在乡吉特委领导下，合并一起改编为政卫二支队，驻地仍以乡宁鹤坡、石邱和汾城的盘道为中心，县委书记廉怀德同志赴晋西南区党委学习，由我代理县委书记主持工作。

一九三八年农历腊月十五日，日军二次侵占汾城，经过八个月的组织整顿建党和民运工作开展，较之第一次汾城沦陷是大不相同了。村村都有自卫队，鸡毛信传送情报天天不断，特别是我们的党员探敌情、送情报，成为当务之急的工作了。其中城关支部（包括北关、纸巷、东关、小东关、大南关、城内）更是首当其冲，义不容辞，大部分党员都主动搞起情报来了。当时，县委住盘道新院曹随随院内，我们收到情报，即马上报告政卫二支队。先是我城关支部张贵来同志被敌人抓入城内当了几天苦力。有一天傍晚临出城时，发现敌人准备出发，急向支部书记张绍寿汇报。张星夜赶来盘道报讯，话犹未尽，城关支部另一个党员李连生同时从差徕局获悉敌人行动，飞步前来报告。我立即将这情况报告支队部。并对张、李给予表扬，要求继续注意敌人动向，及时联系。送他二人绕道尉村返汾城。我们即匆匆转移，还没上到祖师庙，枪声已响了。我×大队张号同志带兵正在山头严阵以待。在他们掩护下，我们安抵鹤坡。由于我军迎头阻击和主动转移，敌人碰了一鼻子灰还稍有损失。党组织拥军送情

报，我军保护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这是真真正正的党军关系，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使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形势的发展，战争的需要，谷梁同志指示我建立了政卫二支队敌工股，由我任敌工股长，直属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领导。当时科长是程谷梁同志，付科长是雷起云同志。

我当时年仅十二岁，只知道满腔热情地发动城关支部全体党员大搞情报，整个敌工股的具体工作，都是程谷梁同志指示进行的。

首先，谷梁同志告我们说：“对敌人占领汾城要作长期准备，不要幻想敌人还会自动撤退，一切都要作长久打算，全面安排”。

其次，以城关支部为主搞情报，不能一窝蜂乱来。要注意敌人破坏，要防止被敌人一网打尽。为此，我们采取了分工分组分头工作的办法，将城关支部党员一分为二，建立了两个组，另外还建立了一个非党组，共是三个组，互不发生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是：万一有一个组被破坏，其他组仍可正常工作。例如李连生同志曾一度被敌人扣捕，其他组仍正常送情报，我们工作不受影响。再如几个组都送情报便于对照比较分析研究，作出正确判断。例如：有一次张组从堡部观察敌人有出发动向，李组从差徭局获悉，敌人要三十辆马车，我们即分析敌人可能是增兵减员而不是扫荡，因为上西山是不用马车的。但仍马上送报支队部，第二天，敌人果然是往史村搬运给养去了。

当时的三个组是：

（一）、张绍霖、张贵来、牛振海。

(二)、李连生、赵步云、李来生、张元冲、李洪信。

(三)、王廷珍、王廷玺。

三个组的活动范围亦根据实际情况，各找对象，多头发展。

1、张绍寿组。主要是通过张贵来同志打入皇部当苦力头，观察日军动向及兵员增减情况，天天出城报告，后又加上被捕入城在伪新民会干事的李洪信同志，亦划归张组共同工作。

2、李连生组。主要在日伪差徭局，由李连生同志争取了伪差徭局会计张南轩、办事员李之林、张子贞、吉星耀等同志，通过敌人要马车，要苦力，要柴草物资，掌握敌人动向，天天报告。

3、王廷珍组。主要活动于伪维持会，利用维持会长关文轩、办事员车锦亭了解敌情，收集物资，天天报告。

第三，在谷梁同志指示下，我们对所有敌工同志，不断进行爱国教育和气节教育，天天准备被捕，时时准备口供，并要求严守机密，不准发生横的工作关系，李果村、张高村、西中黄均各有交通联系点，各找亲友，以防万一。各组每晚送情报一次，遇紧急情报则不分昼夜，立即出发，并携带枪以自卫之。交通上来了，我们分别接待，不准互相透气，以防泄密。

日寇二次侵占汾城，摆下一付赖着不走的架势。

首先是搜罗奸，建立伪政权。先抓张高村张丙夏（前清举人，三十年代曾任陕西省宜君县长），张丙夏拒不出任，乘机逃出汾城，移居北膏腴，忧病而死，全节以终。后请柴寺村贾鸣梧（前清拔贡、曾任国会议员），贾抬棺厅

堂，以死明志，敢来则仰卧床头，闭目不语，致敌无可奈何。日军说：“他的老的老了的，快快的死了死了的，不行不行的”。后来从曲沃县弄来了一个料子鬼周鼎臣当维持会长，不到一个月在东坡堡挨了黑枪。这一段，我们在城外大力开展反维持锄奸活动，我党一区西李村锄奸组李子云带领程春生、董佩烈等人，在西李村去南李半路，截获进城开会的连村伪代表李述禹（外号四鬼子），当场击毙。并宽大了北固县村伪代表张××。迫使许多进城资敌伪代表纷纷向我方挂号联系。“身入曹营心在汉，誓作白皮红心人”。如：西李村程廷臣，南李村×五福，郭店村梁雪顺、义顺村×景寅、张高村张东阳、薛庄村薛天来、西村张良斗、北李村李文元、东彭村周树娃、定兴村张金生等都通过不同渠道和我们建立了一定联系而为我所用，有力掩护了我方人员活动，极大地便利了我们敌区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声威所震，大批投敌汉奸屁股闪电，各投门路，这对我们在敌内争取汉奸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谷梁同志又及时指示我们，对争取到手的城内日伪人员，按其具体表现，分头联系，区别对待，建立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是：

一、利用关系

广泛交朋友，大量拜弟兄，凡是一切可以接触的汉奸特务伪警人员，都通过可用关系，晓以民族大义，告以切身利益，争取为我所用。例如：对伪维持会长关文轩，就是通过王廷玺和他建立联系，曾多次给我们送情报并搞过一些油墨、腊纸等奇缺物资。伪县公署财政科长柳裕斋；伪警察所

巡官周子如、曹春管；伪差徭局办事员罗保林也均利用关系，给我们作了一些工作。

二、工作关系

通过争取教育，积极向我方提供情报，收集物资，并经过一段考验，确有爱国觉悟忠实可靠者，即建立为工作关系，属我方正式工作人员。列如：伪差徭局办事员张子贞、吉星耀，自始至终积极为我方工作，特别张子贞家住纸巷村，作了我们的交通站，其妻白娥子担任了接待员，都属于工作关系。

三、组织关系

工作上一贯积极主动，老实可靠，并具有一定阶级觉悟，追求进步，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并经过教育，遵守党纲、党章，经过一定时间考验，发展为党员的均属组织关系。例如：政变前即向党申请，政变后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入党的张南轩和李之林同志，以及后来入党的薛元章、阎笃林、李梦熊同志，均属组织关系。

为了保证情报工作顺利和敌工同志安全，我们以支队部名义发给每个敌工同志一个布质凭证，上写：

兹有我部情报员×××同志，前往××一带侦察敌情，沿途往返，希军警岗哨验证放行。

下边注明有效期三个月或半年，加盖关防。当时城内敌工人员，持证可回家探亲了。他们把这玩意叫“保证”，视如珍宝。而也进一步大大便利了我们在敌内争取汉奸，壮大敌工队伍。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上有程谷梁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示，下有全体同志爱党爱国忘我工作，以城关党支部为中心，建立了一支精干的敌工队伍。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我们的情报越来越多而且准确，虽不能说十报十准，但十报九准，当时确是事实。因而更进一步引起党领导重视关怀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任与支持。由于工作需要，敌工股移住照壁山下曹滋轩窑内，从连队抽来赵连成同志专送情报。开灶做饭，招待交通，昼夜工作，马不停蹄。回忆当年情况，不禁许多滋味在心头……。

(三)

一九三九年六月，政卫二支队改编为新军二一三旅，七月一日正式召开建军大会（这个时间是于占元告我说的）敌工股亦升级为敌工科，仍由我任科长，直属旅政治部领导，政治部主任是程谷梁同志。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敌工工作的需要，敌工科逐步扩大加强。我介绍贾怀智专管文书，又调来里大池同志任交通，一切初具规模，工作亦向多方而开展。先是贾怀智同志争取了史村伪维持会长柴玉峰，柴玉峰又争取了办事员李华堂，并组织了柴寺村×成林当交通员，使我们进一步掌握了史村敌人兵员增减及辎重运输情况。谷梁同志又从襄陵地方党介绍来梁茂林同志，负责襄陵方面敌工工作（当时襄陵日伪县署驻赵曲），梁茂林同志介绍古城一位王老头当交通，多次送来情报。使我们古城西王方面的敌情，亦了如指掌。

艰苦奋战的二一三旅日益壮大。秋林会议后，全国反共逆流象魔鬼似的跟踪而来，阎日合流初步形成。所以当时沿

姑射山乡宁前沿一带，南有三十四军和新编十四团（团长段勇杰，行伍出身，是一个爱国军人，和我们关系很好），新编十五团（团长陈鸿宾是程谷梁、周义中山西大学的同学，政变前夕曾派人骑马来盘道送过消息），北面有六十一军，而敌人却唯独视这支真正抗日的新军为眼中钉。每次出发扫荡，都是矛头直指二一三旅。由于我们的情报及时而准确，给部队能提供主动灵活的条件，每次战斗，敌少则迎头阻击，坚守祖师庙桃花洞一线，使敌人难越雷池一步。敌多则转移迂回，使敌人劳师往返，捉不到目标，敌退时我又相机侧击，占点小便宜。我军越战越强，士气越来越高，二一三旅这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得到全县广大群众热情支持和拥护。“母亲劝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歌声响遍姑射山野。全县数不清的拥军爱民模范事例，到处流传。我军还轮调部队相机下山，主动出击，护军扩枪，有力地支持保护了县区民运工作开展。

敌工科的情报准确及时，在部队中广为流传，据军干校学员柴效思同志说：文革中翁思英同志被流放襄汾还对他说过：“当时只要郑怀礼不上山，就是没事，一旦敌工科全部上来，那就是情况紧急，要准备战斗了”。而时至今日，许多二一三旅老战友，见面互不相识。提起敌工科均能说个一二三，并知有郑怀礼其人。就连友军十四团也主动和我军靠拢，要求和我们交换情报。

敌工组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切以党员为基础进行的。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城关支部全体党员搞情报则为其中心服务。情报工作有力地支持了部队发展壮大，越战越强。而部队反过来又有力地保护县区各级党政群团的民运活动和军

粮军鞋任务的完成。我当时身为县委宣传委员兼二一三旅敌工科长，除分管一区农村支部外，党、政、群、团同志亦均由我分管。这就进一步密切了地方和部队的关系，敌工科不仅在提供情报方面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也成为指导县区工作同志活动的联系中心和保护站了。同志们来来往往，都先到敌工科问讯一下敌情如何？晚则留宿而求安全。包括特委交通王锦文、徐克同志来来往往，也经敌工科打听消息或投宿。

敌工科工作顺利开展，党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唯一力量源泉，全靠党的领导，我当时年仅十九岁，只知听话敢干，一切都赖谷梁同志事事操心，他指示我们一切工作方法，则均无往而不胜。周义中同志亦多次下山，亲临指导，关怀备至，并于深夜接见城内敌工人员张南轩同志，予以重要指示和亲切地教育鼓励。五七团驻地较远，张汉丞亦两次亲临敌工科视察指导。由于工作开展，开支增大，由谷梁同志决定，五七、五八两个团每月拨给经费二十元。部队坚持抗战，保护了党组织和人民安全，党组织提供情报促进了部队发展壮大，党政军民亲如一家，在我个人半世纪的经历中，虽非绝后，实属空前。当时，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现在大不一样，全旅官兵一致，待遇平等。职分上级下属，但目标一致，思想融洽，事有大小内外，可谁也不敢欺负谁，更没有发现过阴谋捣鬼互相倾轧的事，官僚主义那个怪物，当时也没见过，忆念一切，历历在目，这是我终生难忘，永远怀念的黄金岁月。我特别怀念死去的谷梁、义中同志……。

当时敌工科住山下，向二战区报表，我的名字由谷梁同志改为张志平，政变前，二战区还专派一位作敌工工作的人

员，但他怕日本人，不敢下山，住在政治部，我去鹤坡找他接头，他还乌里乌拉教了我两句日语（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这位同志我于一九四〇年夏天在阎寨还见过一面，当时他就比初来进步多了。不知如今还健在否。

一九三八年农历十月，以城内敌工人员张南轩同志为主，提出了里应外合奇袭汾城的要求。即张在城内组织李之林（曾任阎军连长）为主，拉通警察所班长解同贵关系，利用警备队内部个别关系，于北门斩关落锁迎接部队进城直捣皇部，收复汾城。这个计划，首先得到义中同志的赞许和支持，我更是热情百倍地十分欢迎，但当我向谷梁同志提出后，他却坚决反对。因为桥儿上战斗刚过不久，五八团二营损失大，郭寿天同志牺牲了，特别是秋林会议后，反共高潮有增无减，磨擦事件接踵而至，“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旦奇袭失利，则得不偿失。但多数同志基于对敌工工作信任和抗敌决心，则坚持主打一下，并提出一旦收复汾城，我军可获得大量补给，对反共逆流，亦是迎头一击，几经折衡，谷梁同志才勉强同意，并严肃指出应谨慎从事，作两手准备。当时旅长郝玉玺同志赴秋林了，由义中同志任总指挥，旅特务连炮兵配合，作战计划由义中亲手拟定。农历十月十八日夜（时间久远，我的记忆不准，如有失误，请当时参战健存的同志予以更正），部队分路从盘道出发，我随义中同志带号兵杜保英直抵长子头，选择杨家坟为炮兵阵地，突击队臂缠白巾，顺李果村直达北城根下。当夜月色昏暗，凉风习习，午夜已过，大家注意城内，专望火光起处，即大功告成。但久久不见动静，前哨传来北门内不见动静，联络不上，且闻东边马蹄嗒嗒，似有骑兵行动。义中同志下令向城内发射炮